

王军 / 著

中国

现代

《文学作品导读》

本书以作品分析为单
位，以历史纵深为线索，
引领读者进入『现代文
学』世界，以对五四以来
文学传统反思的视野，
选取鲁迅杂文，创造社、
语丝社、京派、海派的代
表性作家作品，以及通
俗文学作品进行讲解。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导读

王 军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导读 / 王军著. —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8.5
ISBN 978-7-206-05545-4

I. 中… II. 王… III. 现代文学—文学欣赏—中国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79379 号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导读

著 者: 王 军

责任编辑: 吴兰萍 封面设计: 张 娜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 130022)

印 刷: 长春市南关区太平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6.5 字 数: 240 千字

标准书号: ISBN 978-7-206-05545-4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 000 册 定 价: 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鲁迅杂文.....	1
第一节 鲁迅杂文思想的批判性、否定性.....	1
第二节 鲁迅杂文的思维特征	13
第三节 照相术对孩子的塑造：《从孩子的 照相说起》	30
第四节 人文教育与实用教育：《智识过剩》	33
第五节 反对“瞒和骗”的文字：《文学上的折扣》 ..	35
第六节 在抗日问题上对国民党的洞察：《文章 与题目》	37
第七节 对胡适“新月派”的讽刺： 《言论自由的界限》	39
附：创造社、太阳社对鲁迅的批评——鲁迅在二三十 年代的接受状况	42
第二章 “新文学”二三十年代小说	67
第一节 创造社小说：郁达夫《沉沦》	67
第二节 语丝派小说：冯文炳《竹林的故事》	69
第三节 海派小说：穆时英《白金的女体塑像》	73
第四节 现代视野下的边地文化思考： 沈从文《三三》	83
第三章 “新文学”40年代小说.....	92
第一节 抗日烽火下的女性书写： 萧红《小城三月》	94

第二节	宿命人生：芦焚《无望村的馆主》	101
第三节	战争环境下普通知识者的精神解读： 巴金《寒夜》	110
第四节	钱钟书《围城》的婚恋之战	116
第五节	都市小人物灵魂的透视：郑定文《大姊》	150
第六节	女性追求者的悲歌：耿济之《重逢》 与南婴《季候》	158
第七节	都市心灵的剖析：张爱玲《心经》 与《琉璃瓦》	168
第八节	面向农民的小说创作：赵树理 《小二黑结婚》	172
第四章	“通俗”小说	180
第一节	通俗文人的“故事新编”： 平襟亚《新白蛇传》	181
第二节	滑稽小说：徐卓呆《李阿毛外传》	184
第三节	社会小说：顾明道《粉笔生涯》	186
第四节	海派小说中的婚姻透视：邢禾丽《睡莲》	189
第五节	“东吴女作家”施济美《暖室里的蔷薇》	192
第六节	对商业化教育的批判：慕容睫 《无花的春天》	194
第七节	香港台湾小说	196

第一章 鲁迅杂文

第一节 鲁迅杂文思想的批判性、否定性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樟寿,字豫才,后改名为周树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今绍兴市)东昌坊口。至三十八岁,始用“鲁迅”为笔名。出身于没落的士大夫家庭。1898年到南京求学,先入江南水师学堂,次年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其间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科学”与“民主”。1902年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1904年到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学医,后因为在那里发生的两件事对他影响很大,从此弃医习文。

鲁迅杂文,作为一种报刊文体,及时对社会生活各方面作出反映与评判,如鲁迅自己所说的“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在这一文体中,“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鲁迅曾把杂文分为“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两大类,所强调的正是杂文的批评内涵与功能。翻开鲁迅的14本杂文集,就可以看到一部不停息的批判、论战、反击的思想文化斗争的编年史。灵魂于论战中难免“粗暴”起来,“荒芜”起来,但鲁迅从不后悔于自己的选择,他说,“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面,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起诉无门的一个;

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①

鲁迅认为“人在天性上不可能没有憎，而这憎，又是或根于更广大的爱。”因此他自觉地把从事的文艺创作活动规范在“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范畴里，并引为自豪：“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灵魂的荒凉和粗暴。但是我并不惧惮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辗转而生活于其中的瘢痕。凡有自己也觉得在风沙中辗转而生活着的，会知道这意思。”那种所谓“普遍，永久，完全，这三件宝贝，自然是了不得的，不过也是作家的棺材钉，会将他钉死。”所以，鲁迅故意要制造一些麻烦，多留几片铁甲在身上，给这个世界多一点缺陷。厨川白村说“必须有不安现在的缺陷和不完全，而不住地神往的心，希求的心，在人生才始有意义”，“文艺家，乃是活的人间味的大通人。而不能赏鉴罪恶和缺陷那样的有着臭味的东西，即不足与之共语人间。”由此可以看出，所谓“活的人间味的大通人”，他的思维不仅仅是一旦一方出现，就去找另一方，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善于从负面或逆向去探索事情的根源，研究问题的症结。当然，他也深知自己在现代中国说话是较为尖刻和犀利的，他说他向来常以“刀笔吏”窥伺中国人。但是他也经常警惕自己、反省自己。他说“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他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须与时弊同时灭亡。”

与思想的批判性、否定性相适应，鲁迅杂文的语言也是自由无拘而极富创造力的。他自如地驱遣着中国汉语的各种句式：或口语与文言句式交杂；或排比、重复句式的交叉运用；或长句与短句、陈述句与反问句的相互交错，混合着散文的朴素与骈文的华美，可谓“声情并茂”。另一方面，鲁迅杂文的语言又是反规

^① 鲁迅：《我还能带住》，《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4页。

范的，打破语言对思想的束缚，取得荒诞、奇峻的美学效果。比如有时将含义相反或不相容的词组织在一起，于不合逻辑中显示深刻：“有理的压迫”、“毫语的折扣”、“跪着的造反”等等。有时庄词谐用，“于是他心安理得，天趣盎然，剔剔牙齿，摸摸肚皮，‘万物皆备于我矣’了”；有时名词作动词用，“好像失去东三省，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可以博得‘友邦人士’永远‘国’下去一样”。人们看到的是对现存秩序的大不敬与随意戏弄。鲁迅的杂文，集中地体现了始终没有走出奴隶时代的叛逆性与异质性。下面从鲁迅杂文思想与思维特征两个方面展开论述。

鲁迅运用理性批判武器，从事“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即便到20世纪30年代，他还是称：“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①

“理性”一词成为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关键词时，它意味着所有形形色色的精神力量汇聚到了一个共同的力量中心。E·卡西勒指出启蒙思想家并不是把“理性”“看作知识、原理和真理的容器，而把它视为一种能力，一种力量，这种能力和力量只有通过它的作用和效力才能充分理解。理性的性质和力量，仅从它的结果是无法充分衡量的，只有根据它的功用才能看清。理性最重要的功用，是它有结合和分解的能力”。^②这个理解是比较准确和恰当的。“理性”不是被当作“知识”在运用，而是被视为“一种能力”、“一种力量”，一种具有“结合和分解的能力”，实际上，也可以说它具有批判和否定的力量。福柯以为康德界定启蒙方式几乎完全是否定性的，“它是作为一个 Ausgang，一个‘出口’（Exit），一个‘出路’（wayout）而被界定的”，

^①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2页。

^② E·卡西勒：《启蒙哲学》，顾伟铭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

“康德把启蒙描述为人类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不臣属于任何权威的时刻；就在这个时刻，批判是必要的”，“批判是在启蒙运动中成长起来的理性的手册，反过来，启蒙运动是批判的时代”。鲁迅的启蒙思想是“立人”思想，即紧紧扭住“奴”如何转变成“人”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那么，如何大胆运用你的理性呢？鲁迅给出的答案是对形形色色的“奴性”问题的批判和否定，通过对病痛的无情揭示，以引起人们对此的反省和疗救。这正如阿多诺所说的：“打开难以解决的通路的思辨力量是否定的力量。”通过否定的力量、批判的力量，来达到国民性改造的目的。用鲁迅的话来说这不是“寇盗式的破坏”，也不是“奴才式的破坏”，而是“革新的破坏者”，因为在他的内心有“理想的光”。

那么，鲁迅的随笔都言说什么内容和对象呢？如果按照人们所处的地位、身份来划分，他笔下言说的对象还是比较明确的。笔者大致把它分为三类，即统治者、民众、知识分子。在这三类中，统治者的专制制度和愚民政策是造成后两类“奴性”根源的缘故。因此，鲁迅在对这三类的分析、批判和解构的过程中，始终围绕着“立人”思想，即从铲除“奴性”产生的根源入手，进行了前所未有、令人战栗的“灵魂”的审判和拷问。

首先，鲁迅是怎么言说统治者呢？鲁迅批判锋芒指向的统治者，是既有古代，也有当时的统治者，包括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统治者维持其统治的手段主要是靠专制制度，而要促使专制制度的运作，就需建立一套严厉的封建伦理规范和封建等级制度，并动用高压的酷刑政策，因此，鲁迅的随笔主要围绕三个方面鞭挞统治者：

1. 仁义的面具下面掩盖着“吃人”的本质。鲁迅石破天惊地指出“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

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①《我之节烈观》是鲁迅一篇写得非常漂亮的富有战斗性的随笔。鲁迅以带问题写作，层层推进，首先是不节烈的女子如何害了国家？其次是何以救世的责任全在女子？再次表彰之后有何效果？然后，又回过头反问节烈是否道德？多妻主义的男子有无表彰节烈的资格？从而推导出理由的“支离”和“荒谬”，但为什么至今还会存在？鲁迅尖锐地揭示了在古代社会女子多当作男子的“物品”，尤其是到了“人心日下，国将不国”的时候，守节思想反倒发达，“皇帝要臣子尽忠，男人便要女人守节”。而当自己成了被征服的国民，没有力量保护，没有勇气反抗了，只好别出心裁，鼓吹女人自杀。《春末闲谈》，鲁迅由细腰蜂下毒针麻醉小青虫事例生发开去，指出统治者也是想学细腰蜂的“麻痹术”，想让治下的臣民能够被砍去“藏着的思想中枢的脑袋而还能动作——服役，使他们的统治地位永久稳固”，可惜天下还没有发明这种十全的好方法。因而其办法也就不能奏效。中国的历史之所以出现“二十四史”就是一个可悲的铁证。

另一方面，鲁迅通过大量的历史史料说明了统治者更有活生生“吃人”的嗜好，即实质性消灭人的肉体，吞噬人的生命。当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他就不可能把人当作人看待。鲁迅说“至于偶有凌辱诛戮，那是因为这些东西并不是人的缘故。皇帝所诛者，‘逆’也，官军所剿者，‘匪’也，刽子手所杀者，‘犯’也，满洲人‘入主中夏’，不久也就染了这样的淳风，雍正皇帝要除掉他的弟兄，就先行御赐改称为‘阿其那’与‘塞思黑’，我不懂满洲话，译不明白，大约是‘猪’和‘狗’罢。黄巢造反，以人为粮，但若说他吃人，是不对的，他所吃的物事，叫作‘两脚羊’”。在《病后杂谈》这篇随笔中，鲁迅沉痛地指出：“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

^① 鲁迅：《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6页。

鲁迅于文中引述不少的史料来说明这一点，以为：“真也无怪有些慈悲心肠人不愿意看野史，听故事，有些事情，真也不像人世，要令人毛骨悚然，心里受伤，永不痊愈的。”^①在紧接着撰写的另一篇随笔《病后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懣”》，鲁迅仍继续就这个话题深入挖掘，指出：“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直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中国的统治者动用的酷刑花样翻新，名目繁多，这是国外统治者所望尘莫及的。因此，鲁迅对统治者“吃人”本质的揭示，确实令人震撼，入木三分。时至今日学界出现一种论调以为20世纪中国文人的脊梁骨为什么那么软弱？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像俄国沙皇专制下十二月党人的仁人志士和为之赴汤蹈火的群众呢？我想除了时代背景有别、种族差异和思想资源不同外，还有一层原因是沙皇的惩治远不及中国统治者手段的恶辣和狠毒。鲁迅曾给曹聚仁的信中就说道：“别国的硬汉比中国多，也因为别国的淫刑不及中国的缘故。”

2. 面对“羊”显“兽”相，面对“兽”显“羊”相。鲁迅指出：“专制者的反面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三国时，吴国孙皓是一个出名的暴君，但在降晋之后，简直像一个“帮闲”人物；宋徽宗在位时，也是一位不可一世的天子，但被掳后却学会了含垢、忍辱。因此，鲁迅深刻地说：“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动摇的。”鲁迅对暴君的“奴性”根源的发掘，既揭示现象的本质，又体现他的深刻洞察力和无比犀利的笔锋。《晨凉漫记》，鲁迅谈了他阅读《蜀碧》一书的印象。从表面上看，张献忠杀人好像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路，即纯粹是一种嗜好，没有其他目的。其实不然，张献忠开始也并不杀

^① 鲁迅：《病后杂谈》，《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7页。

人，因为他还有幻想做皇帝的希望，后来知道李自成进入北京，接着是清兵入关，自己只剩下没落这一条路，于是他就开手大杀。鲁迅尖锐地说“他分明的感到，天下已没有自己的东西，现在是在毁坏别人的东西了，这和有些末代的风雅皇帝，在死前烧掉了祖宗或自己所搜集的书籍古董宝贝之类的心情，完全一样。他还有兵，而没有古董之类，所以就杀，杀，杀人，杀……”^①因此，历代的统治者和暴君，他们借用恐怖的高压政策和残忍的杀人手段，来维持其专制制度，这是他们内心“以人为奴”的本质反映；同样，当他们塌台或末日来临后，对新主子摇尾乞怜，苟且偷生，这也是他们内心“奴性”本质的必然反映。

3. 古今统治者本质没有改变。在鲁迅看来，无论先是北洋政府，还是后来的国民党政府，他们的统治术与古代的并无实质的差别，有的甚至是有过之无不及。鲁迅以为我们中国好像在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后，一直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其实这也不是“新的添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使奴才主持家政，哪里会有好样子”。因而，鲁迅说：“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对于当时国内政坛纷争，军阀混战，鲁迅看透了这伙人的本质。他说：“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了，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②果不出所料，鲁迅此话出口才不到一年，人间“地狱”活生生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在段祺瑞执政府门前发生

^① 鲁迅：《晨凉漫记》，《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5-236页。

^② 鲁迅：《杂语》，《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5页。

的“三一八”惨案，让国人感到震惊和愤怒，鲁迅愤激地指出：“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即便是到了1927年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时代，“杀人者在毁坏世界”并没有停止。鲁迅所写的《中国人的生命圈》，向来自称“蚁民”的中国百姓“边疆”不能住，有日本飞机在轰炸，据说是在剿灭“兵匪”；“腹地”也不能住，有国民党飞机在轰炸，在剿灭“共匪”，只能住在这二者之间的地带，但也并不安全。再从外面炸进来，这“生命圈”便收缩而为“生命线”；再炸进来，大家便都逃到那炸好了的“腹地”里面去，这“生命圈”便完结而为“生命○”。另外，统治者在酷刑方面，却能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电”的发明，而更见其残酷。鲁迅对当时统治者极其深刻的透视和分析，使他们失去了魑魅的伎俩，现出“奴性”的本相。因此，他在介绍卢那察尔斯基作的《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剧本时，借了堂·吉诃德说的话“新的正义也不过是旧的正义的同胞姊妹”，说出了“革命者为魔王，和先前的专制者同等”的见解。不仅如此，鲁迅对统治者的锐利洞察，也使他对于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看法，超出一般常人的想象，认为即便是“将来的黄金世界，也会有叛徒处死刑”。这种深刻的预见性，显示鲁迅作为一位伟人，他的存在超越一切时空的限制，而成为人们衡量、批判当权者的一个有力的榜样。

其次，鲁迅对民众的批判和疗救。在启蒙的时代里，启蒙者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而是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会造成它们之间的对立，乃至敌视态度的出现。18世纪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对民众就抱着“蔑视”的态度。狄德罗曾说：“民众是所有人当中最愚蠢和最邪恶的。”达朗贝尔则重笔渲染，认为群众是“无知的和麻木的……不可能有坚强有力和慷慨大方的举止”。在伏尔泰看来，民众“永远是一些野兽”。而霍尔巴赫则说是“一些没有头脑的、反复无常的、厚颜无耻的、鲁莽冲动的人，屈从于片刻的热情，是

惹是生非者的工具”。研究者奇西克指出：“即使在启蒙运动的鼎盛期，民众也被看作是缺乏独立思考能力或缺乏独立进行政治判断能力的。”不能不承认，鲁迅对民众种种劣根性的鄙视和憎恨，在某种程度上是与这些 18 世纪启蒙思想家对待民众的态度相类似的。他曾这样沉痛地说：

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满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中国不要提了罢。在外国举一个例，小事件则如 Gogol 的剧本《按察使》，众人都禁止他，俄皇却准开演；大事件则如巡抚想放耶稣，众人却要求将他钉上十字架。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① 鲁迅以为当务之急就是对民众实施启蒙。否则，卑怯的人，即使万丈的愤火，除了弱草以外，又能烧掉什么？如果民众并没有可燃性，则火花只能是将自己烧完。所以，他以为当下“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那么如何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呢？鲁迅撰写的随笔并没有从正面来回答这个问题。他紧紧抓住民众的“奴性”根源，进行深入地挖掘和审视，并在批判、否定、解构过程中，引起人们对它的注意和疗救，从而达到治愈的目的。在鲁迅笔下，民众“奴性”的种种表现都受到一一的关注和批判。1925 年，鲁迅翻译出版了厨川白村的随笔集《出了象牙之塔》，鲁迅在译作后记中对厨川白村赞赏有加，称他是“棘手的文明批评家”，认为在该书的前三篇就“已现出战士而出世，于本国的微温，中道，妥协，虚假，小气，自大，保守等世态，一一加以辛辣的攻击和无所假借的批评”。鲁迅还以为：“著者所指摘的微温，中道，妥协，虚假，小气，自大，保守等世态，简直可以疑心是说着中

^① 鲁迅：《暴君的臣民》，《鲁迅全集》第 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66 页。

国。”鲁迅在这里就对厨川白村指摘日本国民劣根性加以概括和发挥。笔者以为这本身就很可以移来作为鲁迅对中国民众中“奴性”的各种表现形态的概括和批判。

1. 自大。鲁迅抨击汉人常挂在嘴边的“我的大清”，“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人，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所谓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奴才的自大，还表现在骄横和忘却上。鲁迅说：“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活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

2. 苟安。鲁迅认为中国人向来没有争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中国的历史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不断循环而已。所以中国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就行了。^①关于这一点，法国随笔作家蒙田也曾有过类似的看法，他说习惯于君主制的人民，“不管命运为他们提供什么样的变革机会，当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摆脱了某个君主的讨厌统治时，就会赶紧花同样的力气为自己按上一个新君主，因为他们不能下决心憎恨君主统治”。到了“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乱世”，那就发出“莫作乱离人，宁为太平犬”的哀叹声，但叫他起来反抗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鲁迅对这样的民众是痛下针砭和斥责，如果这样的民众，还能够“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

3. 残忍。鲁迅以为：“民众的罚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

^① 鲁迅：《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212-213页。

阔。”这也是鲁迅一再强调的“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愚民一旦有朝一日成为主子，他摆出的谱，还会比原先他的主人更足，更可笑。也正因为他们受惯了猪狗的待遇，他只知道人们无异于猪狗。鲁迅在《偶成》随笔中引一则材料说：“绥拉菲摩维支在《铁流》里，写农民杀掉了一个贵人的小女儿，那母亲哭得很凄惨；他却诧异道，哭什么呢，我们死掉多少小孩子，一点也没哭过。”鲁迅指出“酷的教育，使人们见酷而不再觉其酷，……人民真被治得好像厚皮的，没有感觉的癞皮一样了，但正因为成了癞皮，所以又会踏着残酷前进，这也是虎吏和暴君所不及料”。^①

4. 不信。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和宗教情怀。中国人自然有迷信，也有“信”，但好像很少“坚信”。鲁迅指出：“‘不相信’就是‘愚民’的远害的堑壕，也是使他们成为散沙的毒素。”^②民众的“不信”，促成他们在生活中采用一种游戏策略，既“尊皇帝，但一面想玩弄他，也尊后妃，但一面又有些想吊她的膀子；畏神明，而又烧纸钱作贿赂，佩服豪杰，却不肯为他作牺牲”。鲁迅曾撰写的两篇随笔《送灶日漫笔》和《谈皇帝》，谈的就是这方面的内容。灶君升天的那日，为了防他在天上调嘴学舌，对玉帝说坏话，个个家中都摆着“胶牙饧”，鲁迅说：“我们中国人意中的神鬼，似乎比活人要老实些，所以对鬼神要用这样的强硬手段，而于活人却只好请吃饭。”对付皇帝也有采用“愚君政策”的，只要他“弱”或“愚”。在农村就有老妇人谈如何把皇帝练成“傻子”，终年叫他吃菠菜，并起一个好听的说法，即叫他终年耐心地专吃着“红嘴绿鹦哥”。可见，当民众把一切事儿都当作“笑话”、“游戏”化，你要他们之间相互

^① 鲁迅：《偶成》，《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84—585页。

^② 鲁迅：《难行和不信》，《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页。

配合、相互支持，来进行合群的“改革”，那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这也就是鲁迅担心的“散沙的毒素”在作怪。因此，要使民众觉醒过来，我们必须扫除这吃人的筵宴，挖掉“奴性”的根源，注入大爱和大勇，从而创造出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来。

第三，鲁迅对知识分子的反省与批判。早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知识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就及时地抓住现代社会出现的一个特殊阶层——“知识分子”阶层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撰写后来在学界影响颇大的一部著作《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曼海姆以为关于现代生活中一个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实是：与以往的文化不同，现代生活中的知识活动并不是由一个社会严格限定的阶级单独地来进行。知识分子阶层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不附属于任何社会阶级，而且从日益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里吸收成员”。因而，这个阶层“是能动的、富有弹性的，处于不断的流动状态，永远面临新的问题”。^①现代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既来自社会各角落、各个阶层，它就具有“非附属性”的特点。因而，鲁迅在对知识分子的反省与批判中也不是一概而论，而是带有很强的针对性，这就存在着面对不同的对象，其言说的方式和内容也就相殊甚远、各有边界。

作为知识分子一员，鲁迅对这一阶层的剖析和批判是比较严厉的，他仍然是以挖掘这一阶层的“奴性”根源为己任。必须说明的是鲁迅在随笔中常常将知识阶层称为“知识阶级”是不准确的。鲁迅诠释“知识分子”的含义是较为严格的，他说“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并提出衡量“知识阶级”的标准，即“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按照这一标准，中国自然没有所谓“俄国的知识阶级”，

^① 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树崇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59页。